

1928年中國的排日運動及其對臺、中貿易的影響^{*}

許世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承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摘要

本文利用1928至1929年臺、日兩地的相關文獻，來探究此時期中國的排貨運動對臺、中貿易的影響。大致說來，《日本外交文書》著重的是排日對日本整體的影響，難以得知臺、中貿易受創程度；而臺灣所留下的報紙或稅關統計資料，則對臺與對日影響兼具，顯示出殖民母國與殖民地間的差異性。

再就臺、中貿易關係來看，1920年代末期這場排貨運動，也深刻道出兩地關係在廿世紀上半葉起了重大的變化。隨著中國民族情緒日漸高漲，1920年代以後的日貨抵制運動，對臺、中貿易已轉為負面，及至1928至1929年的排貨運動，對於臺、中貿易的衝擊，又遠較歷次為甚，其最主要的因素，當與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有關。自1919年巴黎和會後，中國即積極循著參與國際體系進行集體協商、與個別國家進行雙邊談判，以實際行動強行收回租界等戰略來恢復主權。終於在1928年分別與美、英簽訂關稅條約，恢復關稅自主權。列強當中，唯有日本負隅頑抗，堅不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導致在本年的「濟南事件」中，遭到長達一年的排貨運動。

而臺灣此際由於和殖民母國的關係更形緊密，因此在對中國貿易上，與日本休戚與共，經常成為中國官民抵制的對象。因此，若從貿易角度來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與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不但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而且是兩個經常處在對立面的國家。

關鍵詞：排貨運動、日本外交文書、臺中貿易、濟南事件

壹、前言

中國自古來即以文明中心自居，常對周遭地區文化抱持鄙視態度，惟近代隨著一連串對外交涉、戰爭的失利，逐步在一般官民腦中醞釀出排外情結；特別是在甲午戰後，對鄰近日本更加嫉視，遂形成一股不可遏抑的排日思想。不過另一方面，由於目睹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逐步躋身世界強國之林，使得學習日本的論調，也普遍在知識分子間流傳，因而排日思想與學習日本的論調遂交錯並存，隨著國內政情與需求互有消長。例如八國聯軍之役甫落幕之際，清廷力圖振作，一時興起學習日本的風潮，不斷派留學生赴日；嗣和議一成，列強壓迫痛苦漸淡去，排日之聲再起，尤其隨著西太后勢力與日俱增，排日風潮更形激烈；迨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學習日本的論調再度出現，不但增派留學生赴日，且從中央到地方，爭相招聘日籍顧問、教師，而皇族大員赴日考察更是絡繹不絕於途，行政組織、法律莫不取法日本；民國建立後，排日情緒再起，加上一戰後的山東問題，更加深對日本反感；同時由於報業興盛，致力鼓吹排日思想，排日風潮遂傳遍全國，形成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日貨抵制運動。¹

總計20世紀上半，中國基於排日思想而來的經濟抵制運動不下九次，²目的除用以發洩民族情感外，更為對抗與日本政治、軍事侵略並行的大規模經濟侵略。其中第一、二次是發生在清帝國時期；³第三次以後則進入中華民國時代，因反對日本的「廿一條要求」，而於1915年3月以北京、上海等都市地區為中心所展開的日貨抵制運動（或稱

1 木村增太郎，〈排日思想と中國人氣質〉，《臺灣時報》第70號，大正4年7月，頁7-8。

2 有關廿世紀上半中國歷次抵制日貨的經過，參見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1895-1945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頁104-107。

3 松本武彥，〈對日ボイコットと在日華僑——第二辰丸事件をめぐる——〉，收錄於辛亥革命研究會編，《中國近現代史論集（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頁221-229；菊池貴晴，「第二辰丸事件」，收錄於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新版）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頁510-11；角儀太郎，〈明治42年臺灣貿易の大勢〉，《臺灣時報》第9號，頁43。

「排貨運動」）。⁴由於實際推動者多為知識分子及少數藉機煽動圖利的商人，加上正逢一次大戰，運輸船隻減少，歐美產品輸中大減，而以中國本地薄弱的民族工業無法生產足夠的民生用品，一旦大規模排斥日本商品，將很難有其他代用品，故持續不久，範圍亦不見擴大。⁵

1920年代是中國排貨運動最密集而頻繁的時期，從導因於「五四運動」的第四次排貨運動，以迄「濟南事件」（或稱「五三慘案」）的第八次排貨運動，不到10年間，中國各界，前後發動了五次杯葛日貨的行動，⁶其強度也逐次增加，在1928至1929年間達到高峰，使得日本對中國貿易在這段期間遭到重大的打擊。

至於原本與華南地區關係密切的臺灣，在廿世紀上半的中日糾葛中，則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日治初期，憑藉著與華南地區深厚的淵源，不但絲毫未受影響，甚至還因此從中獲利；但中期以後，每當中國發生排貨運動，臺灣也無法置身事外，以至於在1920年代末的第八次排貨運動時，臺、日同樣深受其害，對日治以來即已日漸疏離的臺、中貿易更是雪上加霜。

本文擬藉由日本外交文書以及當時臺灣的稅關統計、官私營報紙等文獻來探究本次中國所發生的日貨抵制運動對臺、中貿易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將透過史料解讀，比較身為殖民母國的日本與身為殖民地的臺灣在排貨運動一事上觀察的著眼點之異同。

貳、事件初起時日本駐華官員的觀點

本次排貨運動始於1928年5月，其直接動機固然是由於山東出兵及濟南事件，但因彼時國民軍的北伐即將完成，隨著而來的滿蒙問題、關

4 木村增太郎，〈排日思想と中國人氣質〉，《臺灣時報》第70號，大正4年7月，頁8-9；〈嚴禁排日貨事〉，《臺灣時報》第71號，「漢文時報」頁18。

5 木村增太郎，〈排日思想と中國人氣質〉，《臺灣時報》第70號，大正4年7月，頁8-10；〈大正4年臺灣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87號，頁30。

6 菊池貴晴，〈（增補）中國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頁439-444。

稅增收、條約改正等，早已使得中、日之間的關係暗潮洶湧，潛藏排日風潮的危機。由於在此之前已出現數次的排貨運動，因而事件初起時，日本駐華外交人員，至少有一部分人是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認為此時的排日時機不對，加上中國的內政與經濟問題重重，不太可能成功。此可以從1928年5月15日在上海商務參事加藤日吉致田中外務大臣「關於中國的排日貨運動及其對策」一文中看出。加藤的樂觀，來自於四方面的觀察：一是以往排貨的過程、二是中國的政治問題、三是中國的經濟概況、四是中日貿易品的輸出入季節特性，茲分述如下：

一、中國排貨運動的過程

加藤根據以往的經驗，將中國的排日運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會有市民外交後援會、各路商界聯合會或其他種種團體出現，藉由召開大會或舉辦遊行以提振氣勢，此階段約二至三週；第二階段是組織經濟絕交委員會，派出日貨檢查員，強行檢查或登錄各商業團體的日貨存貨、預約及未到品，時間約兩週；第三階段會限期要求中國及日本汽船不載運通關業者的日本產品，各棧橋倉庫設置值班人員看守，沒收、扣留，甚至燒毀違反品，同時又強制實行組成不賣給當地日本人食品或日用品的同盟、紡織工廠工人與日籍家庭中的傭人罷工，市場商業交易完全停止，這是事態最惡化的階段，衝突事件隨時發生，大約會持續一至二個月；到了第四階段，險惡氣氛漸漸緩和，談判逐步開啟，此時期大約兩週至一個月。

總結上述過程，由最初排貨氣勢上揚起，到實際排貨的進行，大概需要一個月；再經過絕頂險惡期，到恢復期約需兩、三個月。如果從最初著手開始運動起算，則到恢復需要三、四個月。不過在第一及第二階段，大約半個月到一個月之間，日貨交易量會因為預期心理而激增，第三階段雖然會使得交易停止，不過等到第四階段以後，由於需求反彈，也會導致交易激增，結果排貨期中停頓的商務，大部分因為排貨前後的預期心理及需求反彈所產生的大量交易而補足。這是因為日貨大部分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在排貨期間，由於匯兌的關係，有利於輸入，所以敏於商機的中國商人也會趁機輸入之故。

二、中國的政治問題

有幾個問題，會使得南京的中國政府對排貨運動裹足不前：第一，隨著北伐軍持續較平順的進行，直搗軍閥所在的天津、北京，會使得南京方面，唯恐北伐功勞為閻軍或馮軍所奪，而對排貨運動感猶疑；第二，以往受到南京政府壓制的共產黨，可能會提出對外問題作為攻擊政府當局之利器，並趁此機會潛入民眾運動，冀望恢復昔日的勢力，這將給予南京政府當局極大的威脅；第三，鑒諸以往的排日運動，常常無法永續，總是虎頭蛇尾，特別是前一年（1927年）6月以反對第一次山東出兵為動機所發生的上海地方排日風潮之際，紗布交易所的棉絲交易或砂糖交易，讓財界陷入大混亂，損及商民對政府當局的感情。而目前接近北伐完成之際，又有軍事公債、捲菸國庫券等發行計畫，煽動商民內心不喜好的排貨運動，並非得策。

換言之，本次的排貨運動，對中國當局而言，帶有幾分的危險性，特別是鑒於日本的態度強硬，任意煽動民眾的對外感情，反而有在外交上作繭自縛之虞，自然官憲的取締也表現了從來沒有的嚴厲。

三、中國的經濟概況

有三個經濟問題會影響中國官方對排貨運動的態度：

第一，就上海而言，假使日本相關商品的輸出入完全停止的話，南京政府在附加稅收入方面，每個月將失去大約48萬美元，如果再加計漢口、廣東、福州、廈門等港口，每月損失的附加稅更達到60萬美元。而附加稅收入是所謂「二五國庫券」的擔保，這是北伐軍主要的資金，一旦附加稅收入銳減，將阻礙國庫券的償還，使其價值下跌，對國民政府的財政上有很大的打擊。

第二，就輸入品方面來看，如果斷絕日本產品輸入，紡織生絲工廠或其他主要工業會遭受打擊，難以和歐美外國品的輸入競爭；而輸出品方面，上海的主要產品中，麩、棉實、菜種及粕類等幾乎以日本為唯一銷售對象，一旦發起排貨，將造成這些東西銷售無門。同時如果杯葛與日本相關的上海地方工業（如紡織製品），那麼上海棉絲布生產大約會減少一半，中國紡織製品價格勢必異常高漲，此雖然有利於中國紡織業

者，但一般消費者則必須付出不必要的高價。

另一方面，在日本紡織工廠工作的中國工人約6萬，合計其關係者約20萬人的生計會成為社會的大問題。縱令一時如同「五卅事件」當時，付給休業津貼，但時日一久，工人方面究竟無法滿足，最恐怖的是給予共產黨活動的機會。再者，服務於日本家庭中的中國佣人恐怕有萬餘人以上，對於這些人如脅迫罷工，會比對紡織工人的處置更加困難。其他如船公司、倉庫棧橋的罷工，也會造成數萬相關工人陷入失業的結果，而在交通不便的中國，拒絕日本汽船，會造成其本身大大的不便。

要言之，在上海與日人相關的中國工人總數約數十萬，要讓這些人在相當期間集體罷工，一個月大約需要百萬美元的資金，北伐以及其他迫在眉睫的經費已捉襟見肘，現在還有辦法長期支付這樣巨額的資金嗎？

第三，經濟絕交期中，會有各種製造工業以不正常的物價當作衡量標準，企圖發展工業，但這終究非常態性的需求，無法遂行堅實的發達，一旦破產，反而會冷卻持續勃興的企業熱，轉而在大局上，有阻礙國貨健全發展之虞。

四、中日貿易品的輸出入季節特性

先從輸出分布狀態來看，中國輸出到日本有57%是滿洲商品，如豆粕、大豆、煤炭、柞蠶絲、鐵、雜穀類，其輸出季節在秋天，以10月到翌年4、5月間最旺盛，夏季頗為清淡；其次是上海，佔總額的21%，其內容為棉花、菜種、苧麻、獸皮、繭、雞蛋、胡麻、粕類等，大約有六成是長江上游各地的產品，以上海為中繼港，大體上也以秋季為其輸出時期；由天津輸出主要為棉花，大約佔六成，其他有雞蛋、牛皮、雜穀等；青島為落花生、雞蛋、牛皮等，由於大部分是農產品，其輸出的旺季是10月到翌年上半年，夏季為淡季。

其次就輸入品來看，上海佔所有日本輸入品總額的36%，居第一位，主要內容中，棉絲、綿布、其他紡織品佔50%，煤炭、砂糖、海產、紙類等次之，輸入季節大致上從9月到翌年4、5月最盛；其次是滿洲，佔31%，主要商品中，棉製品佔35%，其他有麥粉、機械、鐵

製品、硝子、砂糖、海產物及其他食品等；天津佔10%，以棉製品、砂糖、麥粉、紙、木材為主；青島佔7%，以棉花、棉製品、麥粉、砂糖、藥品、紙類等為主；其他如廣東、漢口也各佔5%，主要是棉製品。要言之，輸入品主要以棉布為主，其中以作為冬天衣著的加工棉布為最重要，其他砂糖、木炭大體上從秋天到春天為需要的季節。

總結上述，不論是輸出或輸入，從晚春到夏季是所謂的夏枯閑散期，由於季節不對，所以預期受到的影響甚為輕微。假設排貨運動從5月左右爆發，到9月左右結束的話，可以說是最佳時機，極富彈性的中國商人，會在該時機之前預先交易，到了秋天，預期排貨終了前再下訂單，從而，由於排貨使得一般民眾蒙受高價與不便，但是部份中國商人卻因此博取暴利。而就大局而言，日本對中國貿易蒙受的打擊也格外輕微，推測每個月平均輸出約減少1,500~1,600萬圓、輸入約700~800萬圓左右。

綜合上述，加藤斷言：「如果考慮以上事情的話，放任一時情感的經濟絕交的氣勢，雖可發揚，但是缺乏永續性，而且如果可以永久延續的話，對中國方面其害可謂痛切。」⁷

參、中國各地的排貨運動——以臺灣相關貿易對手地為探討對象

1928年的排貨運動，雖起因於日本出兵山東與濟南事件，不過臺灣隨即報導了相關的事情。1928年8月的《臺灣日日新報》提到：

據歸自對岸某氏談，最近對岸排日運動，稍有秩序的，殊如濟南事件突發以來，中國國民黨，計畫全國的排日運動，因此結果斷行排日者，有福州、廈門，而汕頭亦自6月1日起，而香港、廣東，初雖視為危險，然目下尚依舊買賣。

7 「中國の排日運動とその對策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40 - 846。

查之本島，自本年1月至5月，輸出大宗品中之砂糖、石炭、棉布、酒精、干錫、鹹魚、貝柱、紅毛土等，除酒精、棉布增加而外，其他概減去。⁸

到了9月，排貨運動在華南及南洋地區如火如荼的展開：

根據最近給臺北某所的情報，南中國對岸一帶的排日漸形惡化，貨物的裝卸等完全斷絕。（中略）除了煤炭之外的日貨完全無法登陸。本次排貨聲明以來，輸入品驟減，漸次日本品的存貨減少。另一方面，物價也相當高。以上不獨福州、廈門、汕頭，在香港、廣東的日本商人也非常的受到影響。⁹

不過如果純就臺灣的相關文獻，並無法看出本次排貨運動的全貌，而必須藉助日本在華外交官的相關報告，這部分收錄在《日本外交文書》中。根據該文書所見，本次抵制日貨範圍包含了上海、漢口、廈門、廣東、汕頭、廣州、長沙、雲南、福州、南京、天津、濟南、北京、杭州、吉林、蘇州等地，幾乎遍及全國。不過本文主要探究事件對臺、中貿易所造成的衝擊，因而對於中國各地的排貨運動不擬一一詳述，唯鎖定在與臺灣關係較為密切的上海、廈門、廣東、汕頭、福州等幾個都市。茲分述如下：

一、上海

前述加藤的樂觀估計似乎持續不久，6月時上海就發生了變化。6月21日，上海矢田總領事給田中外務大臣的電報提到當地排貨運動最近有惡化的傾向，原因之一是黨部方面暗暗的把學生民眾當成後盾；¹⁰這使得上海5、6月份的海運載運量大受打擊。根據加藤副領事在7月11日的

8 〈對岸排日及本島對支貿易〉，《臺灣日日新報》第10138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8月1日），版4。

9 〈南京一帶に深刻な排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0192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9月4日），版6。

10 「本邦綿糸布抑留事件に關する中國軍憲の態度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54。

報告提到，由於排貨運動的影響，上海海運方面，沿岸以及長江航路的日本汽船，中國人的載運量，5月中運出貨物較平時減七成、運入貨物減五成；6月中運出貨物幾乎掛零，運入貨物減了七成，對各社打擊甚大；對日本輸出貨物6月中約減少了三成左右，由日本輸入的貨物5月為52,000噸，與往年相當，但6月與去年同期相比，銳減28,000噸；南洋方面的載運量掛零，以致商船近日有停止南洋迴船的意向。¹¹

到了6月底，上海當地的日本實業家終於按捺不住，各商業團體代表20餘名，每週五集合，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強硬措施，他們認為本次的排日運動，在國民黨的指導下，逐步深刻化，當地總商會內組織「反抗日軍暴行委員會」，恣意設立官民懲罰令，特別是對日貨強制徵收類似關稅的稅金，稱之為「救國基金」。且頻頻沒收日貨，因而切望帝國政府此刻對南京政府斷然要求即刻解散排日團體。¹²總計從5月到8月底為止，當地日本商人受到的廣義打擊損失約600萬 以上，其中以棉布商人最慘。¹³

11月以後，上海地區的排日風波似乎較為平息，據11月3日加藤副領事的電報提到：當地棉絲粗布類在地方的零售以及輸出都比較平順，且11月以後救國基金撤廢。¹⁴但不久，上海特別市反日會發表對日經濟斷交計畫大綱的修正，主要的重點是將持續期間延長到關稅自主實行平等互惠新條約實施為止。關於11月以後扣留的日貨，其處分方式是：對於商品價格100美元以下的物品課徵罰金六成做為救國基金，100美元以上500美元以下七成，500至1,000美元八成、1,000至1,500美元九成，1,500美元以上則加以沒收。¹⁵

二、廈門

11 「上海における排日貨運動の影響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55。

12 「今次排日貨の永續性に鑑みその對策上申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60 - 861。

13 「排日貨運動による邦商の閉店乃至破産續出の見込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68 - 870。

14 「上海最近の排日貨概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82。

15 「上海特別市反日會の對日經濟交措置強化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83 - 884。

5月19日，在廈門坂本領事的電報提到關於廈門對日經濟絕交的實際狀況：

當地官憲的取締依然嚴重，14日入港的商船裝卸貨物時，由於部份排日團，使得苦力突然中止，（中略）一般民眾不知不覺間對日本抱持惡劣的感情，市黨部一派的排日運動（自發的經濟絕交）也暗地裡再興，商人也感受到四周不安的情勢。當地經濟界異常不景氣，日本商品的交易被控制，事實上持續實現對日經濟絕交。¹⁶

到了9月，日本商人方面已蒙受不小的損害，三井出張所的交易額減少了200萬美元，社員數減半；大阪商船從3月以後，當地的載運量只有往年23萬噸的四分之一；臺灣銀行分店的輸入票據交易額普通每月都在30~40萬美元以上，但8月底僅有16,000美元；其他從事棉絲布、海產物、雜貨類交易的內臺商人，從3月以後的交易量也較往年減少三分之一。¹⁷

10月初，廈門當地排日貨狀況仍不見緩和，反日委員會日日增加糾察隊，日夜企圖押收日貨，另一方面持續決議沒收日貨的處分以及處罰交易者等。上月26日將一名購入日貨的中國商人拘禁在木製的籠子裡，上面插著書寫帝國主義走狗奸商之旗子，最近日本籍民為糾察隊押收日貨者頻頻出現，形勢更為惡化。不過日貨依然由內臺商人以化整為零的方式輸入。¹⁸

三、廣東

本地的排日活動開始甚慢，到5月下旬時廣東森田領事的報告提到：

16 「廈門において事實上對日經濟絕交實現せられつつある状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49。

17 「排日貨運動による邦商の打撃深刻の状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73 - 874。

18 「反日委員會による日貨押收および取扱者の處罰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76。

當地官憲持續嚴格取締未經許可的經濟絕交委員會及糾察隊組織的民眾之集會遊行及其他排日的越軌行動，因此日貨排斥並未具體化，不過市民的排日思想從濟南事件以來持續惡化，以市黨部、學生聯合會等為中心，持續慫恿中國商人自發性的經濟絕交，結果，由於中國商人的警戒，日本商品的交易訂購減少，臺灣糖、麥粉、金物、化學藥品、紡織品減少五成，海產物減少七成、硫安及麥酒減少二至三成、水泥、大豆豆粕完全控制買賣，煤炭反而出現好景。¹⁹

廣東的排貨運動之所以進展較慢，是因為廣東商會經濟絕交委員會從一開始就主張經濟絕交是依照商人的自由意志，排除學生、工人等的干涉之態度，委員會舉辦時，有代表者提出反對意見，以至內部陷入不統一的窘境。²⁰

直到7月16日廣東經濟絕交委員會執行委員的第一次臨時會議，才做出七點決議：（一）本月18日以後禁止日本產品的新規訂購；（二）已經訂購完成的日本產品，到20日為止受理申告登記；（三）20日以後禁止日本產品的輸入；（四）同日以後，禁止日本紙幣及票據的使用，並停止對日本的匯兌；（五）20日以後禁止與日本籍銀行進行交易，存放在日本籍銀行的存款速速提出；（六）日本品的庫存從21日迄31日間受理申告登記；（七）違反前述各項者，現品沒收之。²¹

7月下旬，雖然由經濟絕交委員會所組織的日貨檢查隊，從29日起預定以3日的期間開始檢查全市的日貨，但從檢查的實況來看，各檢查隊儘管分別對日貨交易店進行家戶訪問，惟實際上並未對日貨的庫存詳查，只對店員進行排日宣傳，然後便在入口處貼上日貨大檢查的貼紙，從而絕交委員會宣稱從8月1日起為日貨掃蕩期，能否實行，不無疑

19 「廣東における排日悪化の状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49 - 850。

20 「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の活動不能に陥れる原因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52 - 853。

21 「廣東經濟絕交委員會の日貨排斥實行方法決議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56 - 857。

問。²²

迄9月中旬，廣東的排貨運動才緊鑼密鼓的展開，矢野總領事提到：以往的排日運動多半不過是工人學生等不良份子的職業性賺錢主義者，從而糾察隊的收買甚為容易，但是本次的運動由於有省市黨部為後援，標榜商人的自發性運動，其檢查較為嚴格。不只檢查隊的收買不易，如果沒有日貨通過證的發行，搬運不自由時，還有被沒收之虞。再者，由於省內地方數個所的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的活動，在地方零售也有困難，對於日貨交易商人的打擊相當大。總計到此時，中國商人方面，由於救國資金課徵從價三成，損失約兩百萬美元；日本人方面，從5月份排日運動爆發以來，本國人所有貨物無法自由搬運，倉庫的租賃費以及保險費、貨物破損等損害大約109萬美元。²³

四、汕頭

相關的排貨運動報導並不多，5月25日汕頭總商會召集各商業團體，正式成立汕頭商會反日委員會，同時決議依照下列方法實行排貨：（一）已經訂購完成的日貨，在不損害中國方面商人的原則下歸還日本；（二）今後到達的超過日期的無效；（三）各商店報告庫存的商品名稱、商標、數量；（四）同業間互相取締；（五）煤炭、火柴、硫酸、藥劑是必需品，可以放在禁止之外。²⁴

到了8月底，排貨運動仍持續進行，於是中國商人遂透過臺銀中介，偷偷向大阪方面小額訂購，並在大阪變換包裝，假裝成國貨的樣子，或者載到香港更換包裝，或者以當地外人的名義從香港寄來日本的棉布等雜貨類。9月1日起，臺灣銀行也受到抵制，而當地籍民經營的旅館也受到抵制。²⁵

22 「經濟絕交委員會による日貨検査隊組織と其の活動状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59 - 860。

23 「廣東における今回の排日貨運動の特徴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74 - 875。

24 「汕頭總商會反日委員會の成立ならびに排貨實行決議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50。

25 「日貨排斥の現状ならびに日本業者の窮狀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65 - 866。

五、福州

排貨運動的進展也較華中地區為慢，8月24日福州西澤總領事的電報提到：

福州的反日執行委員會於本月21日召開第四次例會，決議：（一）設立仇貨檢查所，其實設在海關以及馬尾，派遣檢查員，調查、扣留輸入日貨；（二）通達當地各工會及總工會，禁止中國勞動者從事日貨的輸送販賣；（三）編成六隊糾察隊，發現偷偷販賣日貨者加以沒收。從23日起，更強力施行，該會常務委員翁侃自己率領3名糾察隊員，將市內日貨販賣分店的店頭所陳列的臺灣產香蕉及罐頭類等產品加以沒收，投入火中。對此行為，中國官憲並未加以取締。²⁶

其後，福州排日貨運動有深刻化的傾向，反日委員會公佈了各種激烈的排日辦法，諸如：（一）依照日貨登記辦法，實施手持日貨的檢查封印；（二）冒禁交易日貨者，沒收該貨並遊街處分（大書罪狀在市內繞行）；（三）禁止日本船隻裝卸貨物。至於執行的事例有：

（一）8月30日，當地電燈會社以其所有的船隻新建號從基隆輸入大量的煤炭、砂糖、香蕉、雜貨等，對此，反日會強行將會社代表處以遊街處分。

（二）9月2日入港的商船大球丸，由於前述排日禁止裝卸貨物，以致僅載運雜貨4噸以及少量的香蕉，而由於排日團的脅迫，搬運船不肯下水，不得已只好以商船「ランチ」載運，今後可以預見當地看不到從內地載運來的貨物。

（三）市內日貨檢查隊橫行，中國人商店內的日貨（主要為棉布類）持續被封印，使得當地排日貨運動有深刻化的傾向。²⁷

10月初，中國人店舖的日貨封印以及迫害中國顧客的事例雖有減少，²⁸不過25日起，反日會的行動有再次死灰復燃的跡象。對於購買棉

26 「福州の反日執行委員會の排日貨決議ならびに實行振り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63 - 864。

27 「福州排日貨運動深刻化の傾向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70 - 871。

28 「福州における最近の排日貨状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77。

布、海產物、香蕉等的中國人頻頻傳出暴行。11月初，反日會員6名突然侵入市門外居住的籍民吳服商林桂的店鋪，撕毀棉布約15匹（124美元）、破壞硝子12枚。²⁹12月時，反日會成員甚至殺了一個從事日貨交易的中國人鄒行貴，引起中國商人的恐慌以及日本領事的不滿，經過福州當地的各國領事聯合交涉，省主席楊樹莊在19日逮捕了殺人犯，才讓當地的反日運動趨於沉寂。³⁰

綜合上述，可以觀察到，與臺灣貿易關係較為密切的幾個地區，其排貨運動的進行程度及時間都不一致：上海的領事在5月份還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但6月時情況丕變，由於黨部的介入運作，使得排貨運動惡化，引起當地日本商人的不滿，紛紛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強硬措施，而7、8月間更造成不少的損失，直到11月才趨於平息；廈門雖然5月已有排日氣氛，但似乎到9、10月才較為嚴重；廣東甚至到7月中才定出辦法，9月中緊鑼密鼓展開排日運動；福州在8月底才強力施行，但屬於間歇性，10月初時趨於緩和，惟10月下旬又再次激烈，甚至在12月時釀出命案，也導致排日運動趨於衰微；至於汕頭則相關報導並不多，似乎其排貨程度不如上述地區激烈。

肆、排貨運動對臺、中貿易的影響

純就外交文書中的領事報告來觀察，與臺灣相關的貿易地區，在本次排貨運動展開的時間與強度，是從華中的上海，再到華南的福州、廈門，至於廣東及汕頭則相對較晚也似乎較輕微。不過詳情是否如此，可以從事件發生的另一方，也就是臺灣方面的文獻來加以考察。

29 「反日會の行動再び露骨になりたる模様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83。

30 「反日會に拉制された日貨取扱い中國人鄒行貴銃殺について」、「鄒行貴銃殺事件のにめ中國商は恐慌に陥り取引杜絶の状態について」、「省黨部は鄒行貴銃殺事件への干与を否定について」、「鄒行貴銃殺事件ならびに日貨排斥に關し楊省政府主席に警告申し入れについて」、「各國領事は楊省政府主席に連名にて鄒行貴銃殺事件責任追及の公文手交について」、「舢舨焼失ならびに鄒行貴銃殺事件の交渉振りについて」、「楊主席が鄒行貴銃殺事件犯人の一部逮捕を内告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98 - 910。

一、貿易品內容與貿易額的影響

事件發生5個月左右，日日新報報導了1928年前9個月的貿易統計結果，發現和去年同期相比，本年對外國（主要為中國）貿易方面，煤炭有11萬噸的減少；海產物如鹹魚乾從250萬圓激減為95萬圓；乾魷魚也從154萬圓減到僅剩39萬圓；至於棉布，雖然蒸汽船貿易幾乎斷絕，但是由於戎克貿易十分旺盛，所以金額略近於去年；在茶貿易方面，由於日貨排斥不僅僅在中國本土，即使在華僑掌握商權的南洋也同步進行，以致包種茶和烏龍茶都一樣不振，特別是烏龍茶前一年9月底為止累計達624萬斤、410萬圓，但是1928年則只剩下435萬斤、285萬圓。其他各項產品也幾乎都是減退的。³¹

表1 1928年1 - 9月臺灣對外國貿易增減概況

品名	煤炭		鹹魚乾		乾魷魚		棉布	
	數量	價額	數量	價額	數量	價額	數量	價額
1928年 1-9月	320,687 噸	3,366,598 圓	5,511,758 斤	951,587 圓	956,068 斤	392,861 圓	9,207,851 碼	2,121,339 圓
去年同期	430,733 噸	4,794,323 圓	20,165,525 斤	2,497,182 圓	3,860,594 斤	1,545,195 圓	9,125,950 碼	1,971,065 圓

資料來源：〈九月迄の本島貿易概観〉，《臺灣日日新報》第1023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0月17日），版n01。

翌年稅關的統計報告指出：主要輸出品如砂糖、海產、煤炭及水泥皆因對岸排貨而受阻，整體輸出額因而銳減38%，連帶使得總貿易額減少了930萬圓；直到隔（1929年）5月以後，日貨抵制運動逐漸衰微，貿易額才又回升411萬圓。甚至輸出香港的同類產品也受波及而減少14%。³²

為了進一步了解本次日貨抵制運動對兩岸貿易影響程度，以下列出排貨期間與前三年同時期平均值的比較（表2）。

31 〈九月迄の本島貿易概観〉，《臺灣日日新報》第1023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0月17日），版n01

32 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移出入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頁50；島田茂，〈（昭和4年）上半期經濟界概況〉，《臺灣時報》第119號，頁38；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3年臺灣貿易概覽〉，頁11；〈昭和4年臺灣貿易概覽〉，頁10 - 11。

表2 1928年日貨抵制時期對中國輸出重要品與前3年平均對照表

項目	單位	1928.6~1929.5		前三年平均		增減額		減少比例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煤	噸	136,742	1,449,564	495,363	5,262,489	358,621	3,812,925	72
綿織	碼	14,469,534	3,538,427	15,282,755	4,041,938	813,221	503,511	12
酒精	升	4,693,625	1,181,423	3,756,863	1,207,995	*936,762	26,572	2
魚乾	斤	15,195,605	1,872,432	22,451,351	2,894,552	7,255,746	1,022,120	35
砂糖	斤	3,389,833	335,804	23,560,363	3,275,459	20,170,530	2,943,655	90
絹織	碼	783,657	500,952	968,829	614,293	185,172	113,341	18
水泥	斤	8,277,095	158,676	40,463,204	841,824	2,186,109	683,148	81
魷魚	斤	734,774	327,585	5,933,309	1,987,662	5,197,535	1660,077	84
燐寸	哥	542,366	354,186	546,988	384,436	4,622	30,250	8
貝柱	斤	263,593	319,584	398,664	493,994	135,071	174,360	35
苧麻	斤	800,060	267,860	1,357,639	497,371	557,579	219,511	46
板紙	斤	785,821	38,730	2,563,627	179,047	1,777,806	140,317	78
其他			3,338,573		5,281,076		1,942,503	37
計			13,683,796		26,966,086		13,282,290	49

註：增減額部分，除酒精『數量』為增加外，其餘物品之數量、價格皆減少。

資料來源：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移出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頁52。

如表中所示，在本次排貨期間（1928年6月迄翌年5月），減退最多為砂糖（90%）、魷魚及水泥（80%）、煤及板紙（70%），其餘物品約40%至2%不等。砂糖輸出減少雖有部分原因是由於世界糖價低落，但和煤炭一樣，主要都是受到日貨抵制運動所累，銷路逐漸為外國產品侵蝕；水泥因島內需要而無暇顧及海外市場；板紙因商機關係，主要輸往滿洲；海產物的減退則是漁獲減少與排貨問題各半；其他各品亦或多或少受到抵制的打擊。總計貿易額較前3年平均減少1,300萬圓（49%），其中真正受到日貨抵制影響的部分約800萬圓（30%）上下。³³

日治時期臺灣對中國的貿易，初期仍以自身商品為主，領臺初期輸出品主要有烏龍茶、包種茶、米、砂糖、苧麻、油糟、胡麻子、龍眼等。³⁴惟日本轉口的中繼輸出品則有後來居上之勢，明治末年起，日本

³³ 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移出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頁52。

³⁴ 井出季和太，〈臺灣改隸前後の貿易〉（下），《臺灣時報》第134號，昭和6年1月，頁32。

商品開始透過臺灣轉口輸出中國，至1913年大幅增加，漸取代本島產品。最早輸出中國的日本商品是火柴，1911年即有輸出記載，以往都是作為戎克船回航時順道載運的東西，因中國本身亦有製造，故輸出額尚不多；³⁵接著海產（魷魚、乾魚、鹹魚等）也從1911年起開了經本島輸出對岸的端緒，翌年日本郵船會社在運送上進行改善，強調運費低廉及產品送達迅速，使得銷路更形擴大。³⁶1913年開始，藉由戎克船向福州、廈門、泉州地方輸出增加，連續三年位居輸出品第三位。³⁷此外綿織物也是重要中繼品，1915年火柴、綿織物、海產等內地品輸出金額達到300餘萬圓，佔當年對中國輸出額的3/5以上，相當值得注目。³⁸昭和時期，輸出中國的前幾名，泰半是內地轉口產品（表3）

35 角儀太郎，〈明治44年臺灣貿易概況〉（上），《臺灣時報》第31號，明治45年3月，頁27。

36 〈昨（明治45）年中の臺灣貿易概況〉（下），《臺灣時報》第45號，大正2年6月，頁36 - 37。

37 〈大正2年臺灣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56號，大正3年5月，頁45。

38 〈昨年中（大正4年）の臺灣財界〉，《臺灣時報》第78號，大正5年3月，頁52。

表3 臺灣對中國貿易歷年重要輸出品（1911 - 1930）

年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911	包種茶	砂糖	苧麻	龍眼	煤	糖蜜	燐寸
1912	包種茶	苧麻	龍眼	燐寸	煤	糖蜜	胡麻子
1913	包種茶	苧麻	乾鹹魚	綿織物	燐寸	煤	龍眼
1914	包種茶	苧麻	乾鹹魚	石油	燐寸	綿織物	煤
1915	燐寸	包種茶	乾鹹魚	綿織物	苧麻	石油	魷魚
1916	燐寸	砂糖	米	鹹魚	綿布	石油	苧麻
1917	砂糖	燐寸	綿布	穀粉及澱粉	鹹魚	石油	魷魚
1918	砂糖	燐寸	綿織物	煤	龍眼	苧麻	酒精
1922	砂糖	煤	綿織物	水產物	水泥	米	苧麻
1923	煤	砂糖	水產物	酒精	綿織物	龍眼	苧麻
1924	砂糖	水產物	煤	綿織物	酒精	燐寸	苧麻
1925	砂糖	水產物	煤	綿織物	酒精	水泥	燐寸
1926	煤	水產物	綿織物	砂糖	酒精	水泥	絹織物
1927	煤	綿織物	魷魚	砂糖	鹹魚	乾魚	酒精
1928	綿織物	煤	酒精	乾魚	鹹魚	絹織物	砂糖
1929	綿織物	煤	鹹魚	酒精	乾魚	魷魚	包種茶
1930	綿織物	煤	酒精	乾魚	包種茶	鹹魚	水泥

備註：依輸出額排序

資料來源：《明治45（大正元）年臺灣外國貿易年表》、《大正4年臺灣外國貿易年表》、《大正6年臺灣貿易概覽》、《大正7年臺灣貿易概覽》、《大正12年臺灣貿易概覽》、《大正13年臺灣貿易概覽》、《大正14年、大正15年、昭和元年臺灣貿易概覽》、《昭和2年臺灣貿易概覽》、《昭和3年臺灣貿易概覽》、《昭和4年臺灣貿易概覽》、《昭和5年臺灣貿易概覽》

甚至到了1932以後，內地中繼品幾乎都佔了一半以上。（表4）

表4 臺灣產品在對中國輸出所佔比例（單位：千圓（%））

年份	本島產品	內地中繼品	輸出總額
1932	3,440（53）	3,094（47）	6,534
1933	1,995（42）	2,751（58）	4,746
1934	2,656（32）	5,719（68）	8,375
1935	6,021（46）	7,025（54）	13,046
1936	2,555（32）	5,324（68）	7,879

資料來源：保田次郎，〈事變と臺灣經濟界の動向〉，《臺灣時報》216號，昭和12年11月，頁38 - 39

因此，這次排貨運動對臺、中貿易的衝擊，除了砂糖及煤炭產自臺灣之外，其他較大宗的魷魚、水泥、板紙等，等屬於來自日本的轉口品。

二、地區別的衝擊

就本次排貨所造成的影響來看，似乎是遍及全中國，因而當年對中國整體貿易額減退不少。根據日日新報的報導，1928年臺灣對中國地區的貿易，到11月末為止，輸出方面，對中國、關東州、香港都比去年減退；輸入方面，來自關東州、香港減少，來自中國則有300萬圓的增加，與日本內地大異其趣（表5、表6）。³⁹

表5 1928年1 - 11月臺灣對中國輸出概況（單位千圓）

	昭和3年（1928）	昭和2年（1927）
對中國	14,108	23,164
對關東州	752	814
對香港	4,745	5,475

資料來源：〈排日排貨裡の本邦前年度對支貿易（下）〉，《臺灣日日新報》第1032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7日），版3。

³⁹ 〈排日排貨裡の本邦前年度對支貿易（下）〉，《臺灣日日新報》第1032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7日），版3。

表6 1928年1 - 11月臺灣從中國輸入概況 (單位千圓)

	昭和3年(1928)	昭和2年(1927)
來自中國	25,879	20,696
來自關東州	2,049	4,201
來自香港	58	86

資料來源：〈排日排貨裡の本邦前年度對支貿易(下)〉，《臺灣日日新報》第1032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7日)，版3。

再根據警務局的井出事務官關於基隆稅關的調查，本年1到9月的九個月間，僅僅是基隆港的對岸輸出貿易比起前年減半，比起去年，減少了六成多，不論本島或對岸的中國商人都感到深刻的痛苦，一般的消費者也因為沒有輸入銳減而飽受物資缺乏、物價暴漲之苦。進一步舉出過去3年間，基隆的對岸輸出貿易額，天津、上海、溫州、福州、廈門、汕頭、廣東及其他，大正15年度(1926)為16,915,000圓、昭和2年度(1927)為13,432,000圓，本年(前九個月)為8,142,000圓，其激減程度甚為明顯。⁴⁰

如果從較長的時段來觀察，將本年與過去5年的累計比較的話，對中國輸出貿易的趨勢在1926年達到高峰之後逐漸減少，到了1928年，對中國的輸出將近只有1926年一半的慘狀，輸入貿易也有類似的情形(表7、表8)，足見本次排貨確實對臺、中貿易造成了極大的衝擊。⁴¹

表7 1924~1928年臺灣對外貿易輸出統計 單位：圓

年 度	大正13年 (1924)	大正14年 (1925)	大正15年 (1926)	昭和2年 (1927)	昭和3年 (1928)
對中輸出	16,346,900	16,556,994	23,138,494	18,511,443	11,982,911
其他共計	24,721,528	24,899,654	30,228,476	26,618,612	19,777,979

資料來源：〈執拗な排日貨の祟り 本島の對中國南洋貿易の衰退〉，《臺灣日日新報》第1028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2月6日)，版3。

40 〈排日運動に祟られて對岸輸出激減〉，《臺灣日日新報》第1027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1月27日)，版2。

41 〈執拗な排日貨の祟り 本島の對中國南洋貿易の衰退〉，《臺灣日日新報》第1028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2月6日)，版3。

表8 1924~1928年臺灣對外貿易輸入統計

單位：圓

年度	大正13年 (1924)	大正14年 (1925)	大正15年 (1926)	昭和2年 (1927)	昭和3年 (1928)
對中輸入	16,980,875	20,118,651	20,357,794	19,438,902	18,953,008
其他共計	23,973,330	28,215,182	37,204,182	40,466,669	27,257,042

資料來源：〈執拗な排日貨の祟り 本島の對中國南洋貿易の衰退〉，《臺灣日日新報》第1028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2月6日），版3。

如果進一步分析中國各地區受到衝擊的情形，可列表如下：

表9 1928年1~9月臺灣對中國及南洋輸出概況

(單位：圓)

對中國輸出	本 年	去 年
華南	9,352,714	14,270,952
華中	1,539,612	3,013,314
華北	459,539	515,799
滿洲	631,046	711,378
對中國合計	11,982,911	18,511,443
對香港輸出	4,159,001	4,180,689
對澳門輸出	5,460	0
對南洋輸出	3,629,607	3,926,480
通計	19,779,979	26,618,612

資料來源：〈執拗な排日貨の祟り 本島の對中國南洋貿易の衰退〉，《臺灣日日新報》第1028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2月6日），版3。

表10 1928年1~9月臺灣對中國及南洋輸入概況

(單位：圓)

對中國輸入	本 年	去 年
華南	3,436,626	4,067,182
華中	2,555,459	2,671,164
華北	216,810	125,911
滿洲	12,744,113	12,574,645
對中國合計	18,953,008	19,438,902
對香港輸入	4,928,063	5,372,304
對澳門輸入	0	9
對南洋輸入	3,375,971	15,655,454
通計	27,257,042	40,466,669

資料來源：〈執拗な排日貨の祟り 本島の對中國南洋貿易の衰退〉，《臺灣日日新報》第1028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2月6日），版3。

將1928年1到9月的貿易統計與前一年的同時期相比，對中國的輸出不論何地都呈現衰退，特別是對華中、華南尤為顯著。輸入方面，滿洲與華北稍好，但華中與華南依舊是減退的局面。足見本次排貨運動受傷最深刻的是臺灣與華南地區的貿易，其次則是華中地區，至於當時與臺灣貿易量較少的華北與滿洲地區則影響不大。

三、城市別的衰退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臺灣對中國的貿易對象一直以華南及華中為主。根據臺灣的稅關統計，從1911到1930年，臺灣輸出到對岸前五名的統計為廈門、福州、汕頭、廣東，以及華中的上海（表11）。至於輸入方面，與輸出的差異不大，唯有溫州略高於廣東。

表11 臺灣與中國主要貿易城市貿易額統計及所佔比例（1911 - 1930）

年份	廈門		汕頭		福州		上海		廣東	
	円	百分比	円	百分比	円	百分比	円	百分比	円	百分比
1911	1,902,814	51.98%	454,100	12.40%	172,286	4.71%	511,419	13.97%	2,189	0.06%
1912	2,606,060	61.12%	615,780	14.44%	265,664	6.23%	211,403	4.96%	2,901	0.07%
1913	1,321,011	45.26%	552,876	18.94%	357,632	12.25%	153,061	5.24%	557	0.02%
1914	1,372,984	39.45%	539,961	15.51%	721,513	20.73%	200,853	5.77%	26,433	0.76%
1915	2,006,713	39.99%	1,107,903	22.08%	888,583	17.71%	210,252	4.19%	39,151	0.78%
1916	3,172,132	30.52%	2,773,064	26.68%	1,765,576	16.99%	1,575,224	15.16%	59,385	0.57%
1917	4,690,058	32.07%	2,949,250	20.17%	2,757,516	18.86%	1,867,771	12.77%	767,876	5.25%
1918	4,435,260	29.58%	2,933,545	19.56%	2,417,758	16.12%	3,076,004	20.51%	244,384	1.63%
1919	3,833,587	29.80%	1,480,957	11.51%	1,660,416	12.91%	2,959,499	23.00%	324,052	2.52%
1920	5,996,545	47.78%	296,579	2.36%	512,746	4.09%	3,228,814	25.73%	430,835	3.43%
1921	4,303,337	43.28%	241,300	2.43%	619,496	6.23%	2,254,524	22.67%	892,617	8.98%
1922	3,930,238	34.86%	741,970	6.58%	767,636	6.81%	2,444,248	21.68%	1,320,435	11.71%
1923	2,295,285	21.81%	1,371,986	13.03%	662,692	6.30%	2,635,463	25.04%	1,763,864	16.76%
1924	5,291,130	23.88%	3,277,750	14.80%	2,741,756	12.38%	5,855,661	26.43%	2,208,597	9.97%
1925	7,721,026	29.31%	3,745,624	14.22%	2,821,116	10.71%	5,146,769	19.53%	2,762,918	10.49%
1926	9,039,884	30.38%	5,580,846	18.75%	3,242,350	10.89%	4,365,354	14.67%	4,531,977	15.23%
1927	8,941,365	36.07%	4,029,341	16.25%	4,472,165	18.04%	3,120,185	12.59%	2,346,004	9.46%
1928	5,922,832	38.71%	1,437,170	9.39%	3,664,685	23.95%	1,088,244	7.11%	1,162,204	7.60%
1929	6,888,684	38.94%	1,779,695	10.06%	4,670,171	26.40%	1,300,094	7.35%	1,090,097	6.16%
1930	3,295,913	32.62%	1,652,749	16.36%	2,474,341	24.49%	726,703	7.19%	1,077,844	10.67%
平均	4,448,343	33.87%	1,878,122	14.30%	1,882,805	14.34%	2,146,577	16.34%	1,052,716	8.02%

資料來源：據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貿易40年表》（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36年），頁393 - 395計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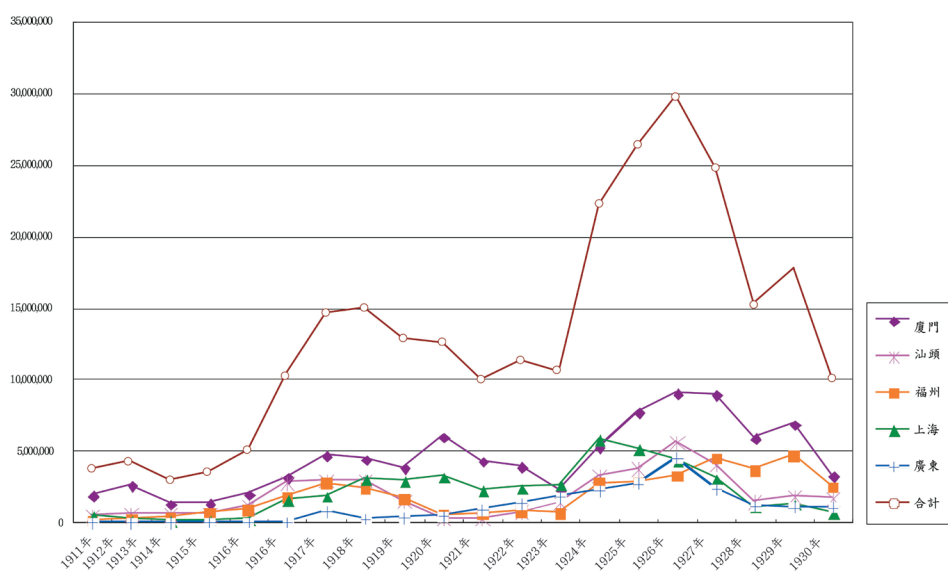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對中國各地輸出貿易額統計(1911~1930)

資料來源：同表11

根據上面的表，1928年臺灣對中國地區的輸出貿易額與前一年相比，廈門減少了300萬居首，其次是汕頭減少了260萬，再次是上海210萬、廣東120萬，而福州則不滿百萬。這樣的結果與前一節日本在中國領事的觀察，有些許的出入。特別是汕頭的部份，在外交文書上關於當地排日的情況報告並不多，但是當年臺灣與該地貿易減少的數額卻高居第二名，除了有可能是當地領事的報告不夠周全外，也可能是對於殖民地臺灣的關注狀況畢竟不如其本國來得大。

四、排貨的遺緒：臺灣與南洋的貿易

排貨運動固然起於中國境內，但不久即擴散到南洋。這可以從前面的表9及表10當中一窺究竟。事發後不久，日日新報提到，由於濟南事件的爆發，「伴隨而來的相等程度的排日貨的進行，現在南洋方面的華僑已經出現，當地的日貨商品減半。」⁴²事件發生3個月後，航行海防航路的北海、海口等日本船都成了空船，作為命令船的商船所受打擊尤

42 〈上半期の貿易と對支貿易〉，《臺灣日日新報》第1013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7月8日），版2。

為深刻；更南方的西貢、曼谷、菲律賓等地的華僑，從華南的排日開始以前，就燃起了排貨之火，各地日本商人的交易形同完全斷絕。⁴³受傷最重的，毋寧是臺灣銷往當地的包種茶。

臺灣的包種茶早在1895 - 1919年間，透過印尼華商的前導，臺灣本土商人的跟進，而在臺灣對東南亞（特別是印尼）貿易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甚至學者認為，論日治時期臺商的東南亞貿易，輸出包種茶至印尼是最具代表性的部份。⁴⁴1920年代起，透過臺商在當地的努力，包種茶在新加坡、菲律賓、暹羅都有不錯的銷售成績。不過在事件爆發後，占本島包種茶輸出額三分之一的新加坡、暹羅、安南等地區，遭遇到當地華僑與中國同步進行排日，從1928年秋天起變成完全無法輸出。這使得島內以輸出當地為主的潮州茶館蒙受重大打擊，甚至憂心包種茶的銷路有為他人所奪之虞。⁴⁵幸而臺灣包種茶在當地的最大輸出地爪哇的包種茶則商況大好，昭和4年初的報導，包種茶的輸出地清一色是爪哇，也都在當地消費。⁴⁶於是臺茶在南洋的銷售概況，受到中國排貨運動的連帶影響，又從分散轉為集中。（表12）

表12 臺灣包種茶輸出南洋各國連年比較表（1926 - 1929）

	新加坡		蘭領印度(印尼)		佛領印度(越南)		比律賓		暹羅		總額
年份	價額	%	價額	%	價額	%	價額	%	價額	%	
1926年	564,458	10.32%	3,981,018	72.77%	1,679	0.03%	110,211	2.01%	813,295	14.87%	5,470,661
1927年	610,620	12.67%	3,753,576	77.88%	2,113	0.04%	99,206	2.06%	354,149	7.35%	4,819,664
1928年	106,076	2.39%	4,208,675	94.84%	0	0.00%	86,809	1.96%	35,874	0.81%	4,437,434
1929年	22,990	0.52%	4,273,127	97.43%	0	0.00%	65,551	1.49%	24,294	0.55%	4,385,96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と南支南洋》，頁30 - 31。

43 〈南京一帯に深刻な排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0192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9月4日），版6。

44 林滿紅，〈印尼華商、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臺茶東南亞貿易網絡的拓展（1895 - 1919年）〉，收錄在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年），頁585 - 636。

45 〈南洋排貨打擊 茶商前途を憂慮〉，《臺灣日日新報》第1032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6日），版3。

46 〈新春の輸出茶 爪哇仕向旺盛〉，《臺灣日日新報》第1032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7日），版3。

五、排貨運動的落幕

這個原先被樂觀估計的排貨運動，持續了長達一年方告落幕。透過稅關統計數字可以清楚看到排貨前後，臺、中貿易的轉變。根據當時經濟界人士以及稅關長西澤義徵的觀察，1929年6月臺灣對中國貿易，較去年同期增加77萬圓，7月雖略減，但8、9月又逐漸好轉。尤其適逢中國企圖以武力收回中東鐵路，因而導致中俄斷交，中國政府為免節外生枝，進一步嚴格取締日貨抵制運動，遂使中、臺兩地的交易漸恢復。⁴⁷結果與去年同期相比，激增了260萬圓（80%）。⁴⁸

至於主要產品的實際增減情形方面，絹綿布、火柴、苧麻、板紙等四項呈現衰退情形，絹綿布係受中國的高關稅所阻，火柴因外國品的壓制，板紙依然大量銷往滿洲有以致之。至於受排貨打擊最深的煤炭，雖然數量增加，價額卻減少，因為排貨運動雖然停止，但久為外國煤炭所蠶食的市場挽回不易，故恢復有限。除此之外，主要輸出品莫不增加，尤以綿布（260%）、酒精（200%）、砂糖（180%）、乾鹹魚（100%）、水泥、魷魚（90%）最為顯著，足見本次空前的日貨抵制運動已告一段落。⁴⁹（表13）

47 島田茂（臺銀頭取），〈昭和4年下半年經濟界大勢〉，《臺灣時報》第125號，頁37。

48 西澤義徵（稅關長），〈昭和3年本島移出入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頁55。

49 西澤義徵（稅關長），〈昭和3年本島移出入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頁53-4；〈本島對外貿易改善〉，《臺灣時報》第118號，頁21。

表13 1928年日貨抵制運動前後臺灣對中國輸出重要品對照表

項目	單位	1929.6~1929.9		1928.6~1928.9		增減額		增減比例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煤	噸	65,235	593,196	55,406	597,853	9,829	* 4,657	0.1
綿織	碼	6,163,111	1,419,377	1,563,509	387,361	4,599,602	1,032,016	260
酒精	升	1,869,050	492,815	640,510	161,043	1,238,540	331,772	200
魚乾	斤	5,785,284	864,443	2,462,706	417,390	3,322,578	447,053	100
砂糖	斤	1,482,761	171,497	567,385	60,980	915,376	110,517	180
絹織	碼	262,730	124,097	337,105	214,063	* 74,425	* 89,966	* 40
水泥	斤	5,109,827	97,780	2,625,670	49,605	2,484,157	48,175	90
魷魚	斤	324,468	188,854	236,555	98,206	87,913	90,648	90
燐寸	哥	111,752	64,894	220,253	146,391	* 108,501	* 81,497	* 60
貝柱	斤	145,854	170,443	116,707	137,036	29,147	33,407	20
苧麻	斤	347,968	114,570	456,943	149,856	* 108,995	* 35,286	* 20
板紙	斤	235,440	10,940	265,356	14,483	* 29,916	* 3,543	* 20
其他			1,896,728		1,154,123		742,605	60
計			6,209,634		3,588,390		2,621,244	70

註：增減額部分，標『*』號者為減少，其餘則為增加。

資料來源：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移出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頁55

此外，日日新報在1929年8月的報導中也提到，本島與華南方面的貿易顯著好轉，特別是顯示了輸出進展之跡象，從本島輸往華南方面，例如煤炭，本年4、5、6月間有15,000噸至20,000噸，7、8月更顯著增加，幾乎呈倍數成長。其中如8月雖然尚沒有明確的數據，但是從現今的輸出狀態來看的話，恐怕不下5萬噸。7月中的輸出4萬噸為輸往香港、廣東合計3萬噸，輸往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合計1萬噸。輸出增加的原因是由於政變與中俄斷交，使得排日終熄，同時由於內閣實施緊縮政策，使得國家財政堅實，匯兌恢復，對美匯兌在44到47美元之間，更令人預期日圓價格看漲，促進輸出。

至於因為排貨停止而迅速增加的是雜貨。輸出雜貨主要是棉布、人造絲、海產（鹹魚）、火柴、水泥、砂糖、酒精、苧麻等。此外煤炭亦然，受惠於政府的緊縮政策，以及排日關係緩和的結果，一般車船運輸的貨流顯著良好。再者，先前由於排貨關係，日貨的庫存被一掃而空，因為產品不足，所以緊急補充，導致輸出好轉。且最近戎克貿易顯著增加，輸出入都旺盛。要言之，對岸中國方面的排日在各地都趨於緩和，加上現在內閣的緊縮，使得對中國貿易好轉。⁵⁰

總結上述，這一場空前的排貨運動，從1928年5月以來，持續長達一年，直到翌年6月才告一段落，從臺、中貿易在這段時間的消長上，正可以看出時間上的變化。

伍、結論

本文主要利用1920年代末期臺、日兩地的相關文獻，來探究此時期中國的排貨運動對臺、中貿易的影響。大致說來，《日本外交文書》著重的是排日對日本整體的影響，所以留下的記錄也較偏向中日

50 〈本島輸出貿易頗に好轉 排日終熄と緊縮政策の影響〉，《臺灣日日新報》第10542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8月23日），版3；〈本島對外貿易改善〉，《臺灣日日新報》第10542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8月23日），版3。

貿易，⁵¹關於臺灣的報導僅有零星數則，⁵²難以得知臺、中貿易受創程度；而臺灣所留下的報紙或稅關統計資料，則對臺與對日影響兼具，⁵³顯示出殖民母國與殖民地間的差異性。即使1920年代臺灣與日本的關

51 如1928年12月6日由在上海加藤副領事給田中外務大臣（電報）提到：關於上海排日貨運動惡化的情況

（一）我國商品的對上海輸出到五月為止都呈現佳境，6月以後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即郵船的裝載到5月為止，24萬5千噸，比去年同期增加7成，前年增加3成；但是從6月起至12月，這6個月間，21萬5千噸，比起去年同期減少12%，比起前年減少15%。

（二）輸入品中影響顯著的是砂糖，到5月為止輸入51萬8,000俵，比起去年和前年同期增加3成以上，但是後6個月大約18,000俵，比去年、前年同期銳減了9成5。其次是海產物，如昆布、海參、鱈魚、貝柱等，總計4萬5,000俵，比去年同期增加4%，比起前年減少了45%；到了6月以後，六個月間，22,000俵，比去年同期銳減五分之一、比前年同期減少十分之一；又鹽鱈今年預計進口50萬反，結果從1月到11月為止，進口不過20萬反，尤其因為魚獲量的關係，比去年同期增加兩成、比起前年減少45%。

棉絲到5月為止，輸入3,600俵，比去年同期減半，後6個月輸入1,800俵，比去年同期幾乎減半；棉布到5月為止輸入1,320萬碼，價格約3,700萬圓，比去年同期加倍的好景，但是從6月到11月為1,600萬碼、3,100萬圓，比去年同期減少了26%。參見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p.896 - 897。

52 整起排貨運動中，外交文書曾提及與臺灣有關的消息僅如下數則：

廈門：「臺灣銀行分店的輸入票據交易額普通每月都在3、40萬美元以上，但8月底僅有16,000美元；其他從事棉絲布、海產物、雜貨類交易的內臺商人，從3月以後的交易量也較往年減少三分之一」；「最近日本籍民為糾察隊押收日貨者頻頻出現，形勢更為惡化。不過日貨依然由內臺商人以化整為零的方式輸入」。廣東：「由於中國商人的警戒，日本商品的交易訂購減少，臺灣糖、麥粉、金物、化學藥品、紡織品減少5成。」

汕頭：「9月1日起，臺灣銀行也受到抵制，而當地籍民經營的旅館也受到抵制。」

福州：「該會常務委員翁侃自己率領3名糾察隊員，將市內日貨販賣分店的店頭所陳列的臺灣產香蕉及罐頭類等產品加以沒收，投入火中」；「8月30日，當地電燈會社以其所有的船隻新建號從基隆輸入大量的煤炭、砂糖、香蕉、雜貨等，對此，反日會強行將會社代表處以遊街處分。」

參見「排日貨運動による邦商の打撃深刻の状況について」，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以下同），p.873 - 874；「反日委員會による日貨押收および取扱者の處罰について」，p.876；「廣東における排日惡化の状況について」，p.849 - 850；「日貨排斥の現状ならびに日本業者の窮狀について」，p.865 - 866；「福州の反日執行委員會の排日貨決議ならびに實行振りについて」，p.863 - 864；「福州排日貨運動深刻化の傾向について」，p.870 - 871。

53 日日新報在本次排貨運動發生不久，曾經推估過其對日、中貿易可能的影響：

就排貨運動前3年間日、中貿易的大勢來看，大正14年度（1925）的輸出入貿易總額為10億3千萬圓，翌年（昭和元年）大約減少8.3%，昭和2年度比前一年減少10.4%，最近兩年間的日、中貿易大約減退了1億8千500萬圓，其中，輸出方面來看，大正14年度總額6億4千萬圓，昭和元年度減少了約14.1%，昭和2年度比前一年減少了11.2%，結果最近兩年間減少了1億5千萬圓，平均每年約減退了7千600萬圓。假如以此遞減率為基礎的話，本年度對中的輸出貿易大致上會減少到4億2千萬圓左右。此等對中輸出貿易的減退，雖然有種種原因，但是主要是由於中國國內動亂的連續，導致購買力減退、中國本身的生產增加以及英、美、德等漸漸在對外貿易方面傾倒力量。而且本年下半期，由於濟南事件的爆發，對中國出兵，以及預想今後對山東方面帝國態度的硬化，伴隨而來的相等程度的排日貨的進行，現在南洋方面的華僑已經出現了，當地的日貨商品減半。參見〈上半期の貿易と對支貿易〉，《臺灣日日新報》第1013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7月8日），版2。

係益形緊密，但臺灣畢竟只是日本諸多殖民地或租借地的其中之一，所以外交文書關於中日關係的記載，即便與臺灣關係密切的華南消息偶會知會臺灣總督，卻絕少將涉臺相關事件當成報告重點。反觀臺灣，則必須要時時留意母國的動態，這種資訊報導的不對稱，正是身為殖民地不得不然的宿命。

再就臺、中貿易關係來看，1920年代末期這場排貨運動，也深刻道出兩地關係在廿世紀上半葉起了重大的變化。中國的排貨運動對於臺、中貿易所造成的衝擊，大致可以一次大戰為分界點而區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前，排貨運動對於中、臺貿易的影響不但不是負面，反而有推波助瀾之效。不過，隨著中國民族情緒日漸高漲，1920年代以後的日貨抵制運動，對臺、中貿易已轉為負面居多。⁵⁴及至本文所述的1928年至1929年的排貨運動，對於臺灣與中國貿易的衝擊，又遠較歷次為甚，其最主要的因素，當與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有關。

1919年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處置，激起當時中國人的強烈愛國心，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氛圍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而山東問題則在1922年2月由中日兩國另行訂約解決，基本承認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同時在6月還簽訂了包括中國關稅問題的九國公約，同意中國在廢除厘金之後提高關稅，而在過渡時期則可徵收一般商品2.5%、奢侈品5%的附加稅。此舉雖與完全恢復關稅自主權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對維持值百抽五關稅歷70年不變的中國而言，顯得意義非凡。此後中國即積極循著參與國際體系進行集體協商、與個別國家進行雙邊談判，以實際行動強行收回租界等戰略來恢復主權。⁵⁵終於在1928年分別與美、英簽訂關稅條約，恢復關稅自主權。列強當中，唯有日本負隅頑抗，堅不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導致在本年的「濟南事件」中，遭到長達一年的排貨運動。事件落幕後，日本亦不得不在翌（1930年）與中國另簽關稅協定。

反觀臺灣，此際由於日本統治的穩固，而與殖民母國的關係更形緊

54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1895 - 1945年〉，頁107 - 108。

55 久保亨著、王小嘉譯，〈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3 - 9。

密，此從臺灣對中國的貿易品，逐漸由土產轉為中繼品亦可得知。因此在對中國的貿易上，可說與日本休戚與共，遂經常成為中國官民抵制的對象。不獨如此，本次的排貨運動，更造成日後臺、中間貿易的不良後果。以煤炭而言，1928年因對岸日貨抵制日益嚴重，煤炭輸出更加不振，多年的地盤逐漸為撫順、開平煤炭及印度煤炭所侵蝕，全年銳減了19萬5,000噸；⁵⁶迄1931年，由於日本的貨幣政策，使煤炭業者承受高工資與物價下跌的雙重打擊，煤炭的產量與輸出更形減少，加上撫順炭入侵，煤炭輸出自此一蹶不振（表14）。⁵⁷

表14 臺灣煤炭輸出數量價額演變（1926 - 1935）

石炭（塊）		
年	噸	円
1926	374,538	4,602,263
1927	296,225	3,538,783
1928	213,793	2,572,168
1929	117,564	1,416,554
1930	66,198	785,050
1931	66,110	723,593
1932	49,634	573,360
1933	70,185	755,828
1934	67,239	728,439
1935	54,823	604,44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貿易40年表》（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36年），頁149 - 150。

前面引述的福州領事報告曾提到本次排貨運動期間，當地中國人對於購買棉布、海產物、香蕉等的中國人頻頻傳出暴行，甚至將市內日

⁵⁶ 島田茂，〈昨（昭和3）年下半年經濟界の大勢〉，《臺灣時報》第113號，昭和4年4月，頁6 - 7；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1號，昭和4年12月，頁46。

⁵⁷ 島田茂，〈本島内外の經濟界〉，《臺灣時報》第145號，昭和6年12月，頁126。

貨販賣分店的店頭所陳列的臺灣產香蕉及罐頭類等產品加以沒收，投入火中。此不獨載於領事報告中，生在當時的臺灣商人，亦有相同記憶。據友人告知，其祖父於1920年代前往福州經商販賣香蕉時，由於遭逢排貨時期，當地人不敢整串購買，只敢趁四下無人時偷偷買一根當場吃完。⁵⁸因此，若從貿易的角度來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與廿世紀上半的中國，特別是1912年之後建立的中華民國，已漸行漸遠，不但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而且是兩個經常處在對立面的國家。

58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史地系張弘毅教授口述，口述時間2011年8月1日。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第一部第二卷）』（外務省，平成2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明治45（大正元）年臺灣外國貿易年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大正2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大正4年臺灣外國貿易年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大正5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大正6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稅務課，大正8年）。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大正7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大正10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大正12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大正14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大正13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大正15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大正14年、大正15年、昭和元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2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2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3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3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4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4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5年）。

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5年臺灣貿易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稅關，昭和6年）。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貿易40年表》（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36年）

二、專書

久保亨著、王小嘉譯，《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辛亥革命研究會編，《中國近現代史論集（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

菊池貴晴，《（增補）中國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と南支南洋》（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昭和10年）

三、論文

井出季和太，〈臺灣改隸前後の貿易〉（下），《臺灣時報》第134號，昭和6年1月，頁28 - 39。

木村増太郎，〈排日思想と支那人氣質〉，《臺灣時報》第70號，大正4年7月，頁7 - 11。

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移出入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2號，昭和5年1月，頁38 - 55。

西澤義徵，〈昭和3年本島貿易概況〉，《臺灣時報》第121號，昭和4年12月，頁41 - 56。

角儀太郎，〈明治42年臺灣貿易の大勢〉，《臺灣時報》第9號，明治43年3月，頁43 - 45。

角儀太郎，〈明治44年臺灣貿易概況〉（上），《臺灣時報》第31號，明治45年3月，頁22 - 29。

林滿紅，〈印尼華商、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臺茶東南亞貿易網絡的拓展（1895 - 1919年）〉，收錄在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年），頁585 - 636。

保田次郎，〈事變と臺灣經濟界の動向〉，《臺灣時報》216號，昭和12年11月，頁35 - 40。

- 島田茂，〈昨（昭和3）年下半季經濟界の大勢〉，《臺灣時報》第113號，昭和4年4月，頁1 - 8。
- 島田茂，〈（昭和4年）上半期經濟界概況〉，《臺灣時報》第119號，昭和4年10月，頁35 - 42。
- 島田茂（臺銀頭取），〈昭和4年下半期經濟界大勢〉，《臺灣時報》第125號，頁31 - 39。
- 島田茂，〈本島内外の經濟界〉，《臺灣時報》第145號，昭和6年12月，頁125 - 139。
-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1895 - 1945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 不著撰人，〈昨（明治45）年中の臺灣貿易概況〉（下），《臺灣時報》第45號，大正2年6月，頁33 - 38。
- 不著撰人，〈大正二年臺灣貿易概況〉（上），《臺灣時報》第56號，大正3年5月，頁43 - 54。
- 不著撰人，〈嚴禁排日貨事〉，《臺灣時報》第71號，大正4年8月，「漢文時報」頁18。
- 不著撰人，〈昨年中（大正4年）の臺灣財界〉，《臺灣時報》第78號，大正5年3月，頁44 - 53。
- 不著撰人，〈本島對外貿易改善〉，《臺灣時報》第118號，頁21。
- 不著撰人，〈上半期の貿易と對支貿易〉，《臺灣日日新報》第1013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7月8日），版2。
- 不著撰人，〈對岸排日及本島對支貿易〉，《臺灣日日新報》第10138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8月1日），版4。
- 不著撰人，〈南京一帶に深刻な排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0192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9月4日），版6。
- 不著撰人，〈9月迄の本島貿易概觀〉，《臺灣日日新報》第1023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0月17日），版n01。
- 不著撰人，〈排日運動に崇られて對岸輸出激減〉，《臺灣日日新報》第1027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3年11月27日），版2。

不著撰人，〈執拗な排日貨の祟り 本島の對中國南洋貿易の衰退〉，
《臺灣日日新報》第1028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
3年12月6日），版3。

不著撰人，〈南洋排貨打擊 茶商前途を憂慮〉，《臺灣日日新報》第
10324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6日），版
3。

不著撰人，〈新春の輸出茶 爪哇仕向旺盛〉，《臺灣日日新報》第
1032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7日），版
3。

不著撰人，〈排日排貨裡の本邦前年度對支貿易（下）〉，《臺灣日
日新報》第10325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1月17
日），版3。

不著撰人，〈本島對外貿易改善〉，《臺灣日日新報》第10542號，
（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4年8月23日），版3。

不著撰人，〈本島輸出貿易頗に好轉 排日終熄と緊縮政策の影響〉，
《臺灣日日新報》第10542號，（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
4年8月23日），版3。

Anti-Japanese campaig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to the Taiwan-China trade during 1928

Hsu Shih-R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d Taiwanese and Japanese related archives to inquiry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since Chinese's Japanese boycott campaign in this period. Generally speaking, "Japanese foreign instrument" is focus on the effect to all Japan of the Japanese boycott campaign. Instead, Taiwanese literatures have both Taiwan and Japan's impact. Again on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late 1920s, this time Japanese boycott campaign that assaulted the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strongly than previou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might be related with the rising China's national emotions. In 1928, China, respectively, signed a customs treaty with the UK and the US to restore tariff autonomy. Only Japan firmly didn't recognize China's tariff autonomy, led Japan should face a year-long Japanese boycott campaign in this year's "Jinan event". But this time, in Taiwa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lonial mother country was ever more closely. Therefore, Taiwan is solidarity with Japan. On the trade with China, Taiwan frequently became the object of boycott. So if we from a trade point to view,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s Taiwan and established in 1912'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were not only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also often in the opposit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 Japanese cargo boycott campaign, Japanese foreign instrument, Taiwan-China trade, Jinan event

臺灣文獻

第六十二卷第三期